

版本目录学 研究

BANBEN
MULUXUE
YANJIU

BANBEN
MULUXUE
YANJIU

袁庆述/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7256.2/2
本书获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会 资助
汉语史重点学科

版本目录学

研究

BANBEN

MULUXUE

YANJIU

B
BML
X

袁庆述 /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版本目录学研究 / 袁庆述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7

ISBN 7—81081—307—2/G·208

I. 版... II. 袁... III. ①版本学②目录学 IV. ①G256.2②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773 号

版本目录学研究

◇袁庆述 著

◇责任编辑: 曹爱莲 曾剑俊

◇责任校对: 胡 勇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8872636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核工业 230 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开

◇印张: 11

◇字数: 247 千字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册

◇书号: ISBN7—81081—307—2/G·208

◇定价: 20.00 元

向版本目录学研究者致敬（代序）

我做学问——如果称得上是做学问的话——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就是求得学界的认同。一点也没有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意思。在古汉语这个领域，我作过多种尝试，语法，音韵，修辞，训诂，还有文字，我都试过。京津上海，川粤江浙，他们认同的，我就挺下去，他们不认同，我就摒而弃之。察人颜色，伺他口风，何其苦也！不是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吗？坐一下可以，坐十年，太长了。我耐不了寂寞啊。

但也有能耐寂寞的，坐冷板凳不厌其长，本书作者袁庆述同志就是一个。他本是拨乱反正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至于今20余年，除了把书教得炉火纯青之外，学术上并无一鸣惊人之处——他的确在坐冷板凳。现在他拿出一件东西来——这本《版本目录学研究》，洋洋数十万言，着实让我惊讶不已。他的导师潘先生以语法史鸣于世，他自己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楚语词汇的，他的日语水平颇高，写过汉和语音对比之类的文章，也有零星的近代汉语词汇的论文发表。我还读过他出色的考据文章，其国学根柢是我素所知的。但他进入文献学这个领域，写出大部头的著作，实在不是我意料中的事。原来他坐冷板凳一二十年，在潜心于版本目录学研究，并不求热闹于一时，叫人钦敬。其行事盖有古贤人之遗风焉。

读书要看版本，科研得找目录，版本目录本是读书人接触得最频繁的。我晚年在做佛经词语研究，佛经版本不少，通常



能见的是大正藏，还有频伽藏、磧砂藏、佛光藏、高丽藏、龙藏，还有中华大藏经、敦煌手写本佛经等，在这上面要花去不少功夫。湖南师大图书馆线装藏书号称丰富，佛经方面的书成千上万，我一拿到它，就非辨别它是何时的本子不可，非弄清楚它的母本是属于哪个朝代的不可。重要是重要，要我专去钻研它却没有动力，枯燥不消说，而且也是为人作嫁，达不到功利目的。况且这门学问太难，不是我等急于事功者所能胜任。在我看来，搞目录学研究，不仅是给读者提供书目而已，还要对这书有所评介。这评介要切合实情，就非常之不易。我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真是字字珠玑（有关政治方面者除外）。再读我们湖南人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正》，他还能就此提出匡正，实属高明之至。结论是，这种事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做得来的。我做别的去。

然而也有人敢于到这个领域里来驰骋他们的才华，这其中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他的这部书，议论允当，叙述系统，立言科学，在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在版本学方面对叶德辉功绩的推崇，以及随处可见的精审的考证，在目录学方面刘向父子对目录学贡献的精确定位，私修目录学的多角度的评介，《校讎通义》的意蕴的全面发掘等，都是超出群伦、力胜以往的。

我虽则常与版本目录打交道，但我坦言，作为一门学问，我是生疏的。姑且说到这里，作为作者命序的一个回应，同时用以表示我对于版本目录学者的敬佩之情。

李维琦

2002年12月



目 录

引论/1

- 一 汉语古典文献的基本构成和纸质文献的广泛流行/1
- 二 文献整理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普遍化导致了文献学的产生/9
- 三 文献学的产生以及它与版本目录学的关系/12

第一章 版本名称的出现和版本学的形成/19

第一节 版本研究历史概述/19

- 一 广义的版本和狭义的版本/19
- 二 古人对版本问题的研究/26

第二节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和版本学的产生/30

第二章 与古籍版本有关的一些问题/38

第一节 古书的记录方式和分类/38

第二节 与刻本有关的常见术语/51

第三节 古书的用纸/64

- 一 纸的发明和造纸技术的改进/64
- 二 古书的用纸/72

第四节 古书的装订和装帧形式/77

- 一 从卷子到册页的装订方式/77



二 古书装帧的常用术语/86

第五节 古书的版式/91

第三章 版本的鉴别/98

第一节 抄本文献的鉴别/99

第二节 刻本文献的鉴别/123

一 活字版和雕版的区别/123

二 刻本文献版本的鉴定/124

第四章 目录和目录学/141

第一节 目录释名/141

第二节 目录学的起源和目录学著作的分类/145

一 目录学的起源/145

二 目录学著作的分类/147

第五章 目录学史上的四个历史阶段及其代表性著作/152

第一节 刘向父子的《七略》和六部分类法的创建/153

一 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刘向父子的《七略》/153

二 班固《汉书·艺文志》对目录学的贡献/162

第二节 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和四部分类法的创立/164

一 魏《中经簿》及其作者/165

二 荀勖的晋《中经新簿》和四部分类法的创立及完善/167

第三节 唐长孙无忌的《隋书·经籍志》和四部分类法的确立/170



一 《隋书·经籍志》简介/172

二 《隋书·经籍志》的特点/183

第四节 我国封建时代目录编制的巅峰——清朝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88

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辑过程/188

二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191

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情况/194

四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特点/212

第六章 私修目录的兴起/216

第一节 阮孝绪和他的《七录》/218

第二节 唐代以后的私修目录/223

第三节 几种重要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简介/250

第七章 古人对于目录学理论的研究/277

第一节 郑樵和他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277

一 郑樵的目录学实践/277

二 郑樵的目录学理论/285

三 郑樵对目录学的贡献/289

第二节 章学诚和他的《校雠通义》/292

一 《校雠通义》介绍/292

二 章氏的目录学思想及其贡献/293

第八章 目录学资料的使用/306

第一节 综合性目录的使用/308

第二节 专科性目录的使用/321



□ 引 论

一 汉语古典文献的基本构成和
纸质文献的广泛流行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构成，很大一部分便是那浩如烟海、灿若繁星的各种各类的文献典籍。

这些文献典籍中，绝大部分是汉语文献，只有极少数是用少数民族语言表达、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这些用少数民族语言表达的文献，时代较早的，如西汉刘向《说苑·善说》所记载《越人歌》，书中说：鄂君子皙泛舟而行，“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谿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沼澶秦逾渗悌随河湖”，鄂君子皙就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招越译而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这首歌的歌辞就是用汉字记音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先秦时代的越语文献。至于时代较晚的，如近现代发现的一些用契丹文、西夏文、蒙古文记录的典籍都属于这一类。这些文献的研究，专门性极强，一般的读者较少接触，而且从整体数量上



看，它们远远赶不上用汉语表达、用汉字记录的文献，因此，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古代典籍，暂时都未将其纳入其中。

文献的分类，随着采用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类别。现在我们以文献所使用的载体为依据，首先将文献分为两大类，即非纸质文献和纸质文献。

非纸质文献的载体，都是自然生成的物质。时代较早的，有甲骨文献，如河南殷墟、陕西周原出土的、以殷商和西周文献为主的甲骨文，它们的载体是龟甲兽骨；有金属文献，如大量出土的周代和战国时代的铜器上的铭文，它们的载体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制品；有简牍文献，如已经出土的将近 20 万枚从战国到汉代、到三国时期的简和牍，它们的载体是用竹或木加工而成的、单枚使用的牍和编连成册使用的简；有缣帛文献，目前发现的主要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和西汉前期的帛书，它们的载体是纺织品；使用时间从上古一直绵延至今的有石质文献，如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战国的石鼓文、汉代的石经，以及很早就已出现，到现在仍在使用的各类墓志、碑刻，它们的载体是天然的或经过简单物理加工的石头：它们都属于非纸质文献一类。

纸质文献的载体是纸，它是一种非自然形成的物质，是由“植物纤维经物理、化学作用所提纯，与分散的纤维素靠氢键缔合交结成的薄膜状物质”（《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潘吉星 文物出版社 1979），也就是说，它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物质。纸的出现，突破了文献载体对文献发展的束缚，使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纸质文献的出现大约在西汉前期，1986 年 3 月，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发现了纸质地图残片，这是通过现代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经过科学仪器测定，



绝无可疑的西汉文帝景帝时代的文献。这证明，自从西汉发明了造纸术以后，纸就开始成为文献的一种重要载体，并且绵延至今，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 20 世纪，才逐渐出现了被其他载体（如磁带、光盘等）取代的趋向。

因为甲骨文献、金属文献、简牍文献、缣帛文献和早期的石质文献都是用古文字，即甲骨文、金文、篆文或战国文字记录的，一般的读者接触、收集和释读这些文献十分困难，所以它们都要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整理，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文献，即经过整理的、以纸为文献载体、以今文字为记录符号的文献，才能为人们所使用，所以，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汉语典籍，并不包括未经整理的非纸质文献在内，而只指用今文字记录的各种类型的古代的书籍。

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大量的抄本文献也就出现了。汉代人在纸上书写文字、抄录文章的事迹，各类史籍上都屡有记载，比如：《后汉书·列女传》记载，蔡邕死后，其文章散失，而其女儿蔡琰能背诵其中的大部分，曹操便提出要派人到蔡琰处去抄录蔡邕的文章，蔡琰说，“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默写出蔡邕的文章“四百余篇”。此外，像“洛阳纸贵”、“蔡侯纸张芝笔”这类成语的出现，也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纸作为文献载体被广泛使用的社会现象。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纸基本取代甲骨、金属、缣帛、简牍等，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大概是东晋末到南北朝时期的事。公元 404 年，东晋豪族桓玄胁迫晋安帝逊位，改国号为楚，自称皇帝，即位后马上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徐坚《初学记》卷



11 引《桓玄伪事》)。朝廷竟然要用命令的形式来推行以纸代简,这证明,一直到东晋末,在“主于敬(以严肃庄重为主)”的场合,人们一般都是用简或牍作文献的载体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需要表“敬”的场合下,如书写朝廷公文、奏章等的时候,纸并没有完全取代简牍的地位。但是,既有“诸用简者”,肯定也就有更多的不用简牍的地方,这又从反面证明,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纸已经成为人们书写的最主要的载体。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较为完整的纸质文献实物,最早的是晋代抄本,可惜的是,它们都是残卷;大量的基本完整的抄本文献的发现,是清代的事。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道士王圆箓无意之间在下寺北边的一个石窟中(今编号为 288 号)发现了一个封闭的暗室,其中堆积着尘封了近千年左右的大量的纸质文献。这些文献的时代始于东晋,终于宋代,以唐五代时的文献为多;文献的内容以佛经为主,也有一些儒家经典、文学著作、医学书籍、账籍文书等;除极少量的刻本文献外,大量保存的都是抄本文献,基本都是以卷子的形式保存的。敦煌文献自发现以来,屡遭中外盗卖者的贩略,其数量已无法精确统计,估计在 40000 卷左右。这证明,纸质文献从晋代开始,已逐渐成为我国文献典籍的主流。

印刷术的发明,对纸质文献而言,是一个记录方式上的飞跃,它使单本产生的抄本文献变成了批量生产的刻本文献,使书籍的流传更为广泛,数量的增加更为迅速,这为书籍的广泛传播和收藏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同时也为它们的保存和留传提供了较大的可能。

根据《宋史·艺文志》的记载,“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版”,即雕版印刷出现于五代时周的显德年间(公元 954—960



年之间)，但根据其他书籍的记载和发现的印刷品实物来看，情况似乎不是如此。近人丁秉衡《荷香馆琐言》称，在山东临朐县社塔中，发现过北齐武平四年（公元 573 年）高侨为其妻雕制的印版，正面 8 行，每行 29 至 34 字不等，“墨迹完整可读”。另外，在新疆吐谷沟也出土过一张有字的纸片，上有“延昌三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字样，“延昌”为高昌国的年号，三十四年为公元 594 年，据考证，这是雕版印制的招贴。虽说它们都是雕版印制的，但都是单张，而书籍的印制则时代要稍后一些。贞观十年（公元 636 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逝世，“上为之恸”，官员们将长孙氏所撰的《女则》十篇上呈太宗，“帝览而嘉叹”，“令梓行之”（明邵经邦《弘简录》卷 46）；唐元稹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作序说，书坊将白诗“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处处皆是”，这是“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即公元 825 年 1 月 2 日的事；唐朝柳玭的《柳氏家训序》云，“中和三年（公元 883 年）癸卯夏……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柳玭为唐代藏书家柳仲郢的儿子，他所记叙的成都书坊刻印书籍的类别和数量都十分可观：这些记载可以说明，至迟不过唐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就已极为流行。如果《荷香馆琐言》的记载可靠的话，我们认为，雕版印刷在南北朝时便已出现，可惜的是，我们至今还未发现更多的南北朝时期和初唐时期的雕版印刷的实物。就我们所知，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书籍的实物为新疆吐鲁番出土的用黄麻纸印制的《妙法莲花经》，每行 19 字，现藏日本，它的印刷时间为唐武后时期，即最晚不会超过公元 705 年；还有唐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间（公元 704—751



年)刻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这是1966年在韩国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另外就是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一个叫王玠的佛教信徒“为二亲敬造普施”而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唐《乾符四年历书》(公元877年)和《中和二年具注历》(公元882年)，这三件实物现在都在英国。

雕版印刷之后，活字印刷也逐渐发展起来。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18中记载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贲王始印《五经》(案：冯贲王指五代时后唐的冯道，他曾雕版印刷群经出售)，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格，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沾，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从这段详细的记载中我们可看出：一是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是在“庆历”中，即公元1045年左右；二是当时或以前还有用木活字印刷的，但似乎效果不太好；三是毕昇的泥活字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了。一种新技术能发展到如此完善，进入到实用的阶段，无疑



要经过相当长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所以我们推断，活字印刷发明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可惜的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并无可靠的实物来证明这一点，甚至连毕昇究竟用泥活字印过什么书我们也不知道。而我们所知道的宋代的活字印刷的书籍，只是根据古人的一些记载，如：南宋绍熙四年（公元 1193 年），周必大用胶泥铜版印刷其自著的《玉堂杂记》活字本；明代有一刻书家用“丽泽堂”的室名雕版仿刻过宋刘达可的《碧水群英待问会元》泥活字本 60 卷；清代的《天禄琳琅后编》卷二记载，有南宋末年印刷的《毛诗》四卷为活字本，“《唐风》内‘自’字横置可证”；另外，缪荃孙的《续记》说宋范祖禹的《帝学》八卷是宋活字本，叶德辉在《观古堂藏书目》所收的《韦苏州集十卷》下记其版本为“北宋庆历胶泥印活字本”等等。但这些都并非最为直接的物证，其印刷所用的活字究竟是否确实为胶泥所制，也不能十分肯定。元朝人王桢《农书》卷 22 说，“近世又铸锡作字”；明朝人陆深《金台纪闻》说，“近日毘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这说明，泥活字以后又出现了用锡、铜、铅等金属材料雕制的活字。明弘治年间，无锡华燧的会通馆用锡活字排印宋李昉的《文苑英华》100 卷等十数种书籍（案：以前曾误认为是铜活字，经今人考证，实际是用锡活字排印的）；清雍正六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过 64 部《古今图书集成》（每部 10000 卷。据乾隆三十四年军机处档案，则为 66 部），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用铜活字排印过顾炎武的《音学五书》38 卷等等。泥活字有其自身的缺陷，而金属活字则价格太高，据乾隆《题武英殿聚珍板十韵》的“自注”，“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板”，而刻铜字每字“工银二分五厘”（见《大清会典·事例·卷 1199》），比一般的刻字



贵几十倍，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泥活字和金属活字始终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与此相反，取材方便、价格便宜的木活字却使用得越来越广泛，比如：元朝大德二年（公元 1298 年），王桢用他亲自监制的 30000 余枚木活字排印了《大德旌德县志》100 部，并在其所著的《农书》卷 22 后面附录了“造活字印书法”，将活字的刻制、排检、排版、印刷的方法说得清清楚楚；清朝乾隆年间，嘉兴人王相（室名信芳阁）曾用木活字排印过很多书籍，而朝廷更用 253050 个枣木雕成的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共有 138 种，2300 多卷。

从技术上看，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要先进得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我国古代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流行，书籍的印刷始终以雕版为主流，所以在我国古代的印本文献中，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而成的。

要注意的是，从唐代印刷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之后一直到清代这一千多年之间，抄本书籍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见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述》和《明代私家藏书概述》，分别载《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 2、1 期），清末蒋汝藻用两年时间影抄完魏了翁的《鹤山先生大全文集》，这部宋刊孤本共 110 卷，100 余万字（见王国维《乐庵写书图序》），这是私人抄写的情况。国家藏书情况也同样可说明这一点，《明史·艺文志》载，“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这说明明宣德年间宫内藏书有 70% 是抄写而成；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有 7 部，也全部是手抄而成。



二 文献整理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普遍化导致了文献学的产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作为文化积累主要代表的书籍在不断地、迅速地增加，与此同时，随着自然灾害的侵蚀、兵燹的毁损、时代的变迁，这些书籍的情况又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对这些日益增多并且处于不断变化状况的书籍随时进行整理，也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的需要。先秦时代，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从卫国回到鲁国，整理《乐经》，“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整理《诗经》，“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根据各国史官所作的《史记》整理出《春秋经》而“乱臣贼子惧焉”：这都是与古籍整理有关的工作。到了西汉，因为经过了前代的战乱，“书颇散亡”，汉成帝便命令谒者陈农访求天下的书籍，收入国家图书馆，又命令光禄大夫刘向率领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等校勘整理这些书籍；刘向死后，汉哀帝命令刘向之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继承父业，续成此事，最后刘歆根据整理的结果，在其父整理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检索目录《七略》和第一部解题目录《七略别录》。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的力量系统地对传世文献进行整理，这为后代的统治阶级整理国家藏书树立了榜样。从此以后，无论哪个朝代，无论哪个统治者，都要根据当时国家图书馆藏书情况和社会流通书籍的变化，对其不断地进行校勘、辑佚、辨伪等整理

